

国事务衙门，奕訢为总理大臣。有学者认为，这是洋务运动破土而出的标志，从此有了推行新政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样是在这一年，曾国藩在安徽安庆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军械所，学习仿制新式西洋兵器，此举则被一些人当成中国进入机器制造时代的象征。

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办安庆军械所，当然是洋务运动最初起步时的两个重要事件。然而，这也仅仅是个开始。设立新的权力机构容易，若想“新政”取得成功，真正学到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安庆军械所刚一创立，就遇到了缺少近代工业生产经验、缺少机器设备、缺少专业人才等一系列问题。正当新兴的洋务事业筚路蓝缕、前行艰难之际，一位在九江经营茶叶生意的广东商人进入了曾国藩的视野，他就是以推动“西学东渐”彪炳史册的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容闳。

容闳，1828年11月17日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镇（今属珠海市），这里距澳门只有四英里，位于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他的父母虽然身份卑微，却思想开明而且颇有远见，早早就发现了学习“洋务”的前景。1835年，容闳刚满七岁，父母便把他送入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的夫人开设的“西塾”接受新式教育。“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势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①

正在全中国有机会上学的孩子都在私塾里死读八股文，寄希望通过科举仕进显达的时候，容闳的父母却把他送进了“西塾”。他们那时已经发现，随着与西方各国通商时代的来临，“洋务渐

^①（清）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等译，钟叔河导读、标点：《西学东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页。



容闳（1828—1912年），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和维新思想的先驱者。1909年他在美国出版《西学东渐记》，记述了自己的一生和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趋重要”，此时若能着人先鞭，便有希望占得先机，出人头地。至于容闳后来取得的成就，已经远远超出其父母的意料之外了。

古特拉富夫人主持的“西塾”，其实是澳门马礼逊学校的预科班。马礼逊博士是来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容闳尊其为“中国之第一传道士”。受英国传道会委派，马礼逊于1807年1月31日由伦敦启程，辗转来到中国，直至1834年8月1日逝世，在华寓居27年。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马礼逊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编纂了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的主臬；他第一个把《圣经》译为中文并刊印出版，使中国人可以直接阅读完整的基督教经典；他设立英华书院，首开传教士设立教会学校的先河；他与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合作开设眼科医局，把西方的医疗技术引入中国……为纪念他的传奇人生，居住在澳门的西方人于他逝世后的第二年开始商议创办马礼逊学校，经过多年筹备，终于

在1839年11月1日招生开课。

1841年，容闳经过“西塾”的最初教育之后正式入读马礼逊学校，翌年随学校由澳门迁往香港。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勃朗先生。勃朗（Rev.S.R.Brown，又译布朗），美国人，183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1839年偕夫人来到澳门主持马礼逊学校教务。容闳没有因为家里贫穷而辍学，以及后来能去美国深造，全凭勃朗及其朋友的帮助。在容闳的心里，一生始终对勃朗怀有感激之情。

1846年冬，勃朗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放弃马礼逊学校的教职，决定回国。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勃朗与他的中国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难以割舍。临行前，他对自己的学生发出公告，表示愿意带他们到美国去完成系统教育，但需要他们自愿报名。容闳是第一个报名者。勃朗考虑到当时在马礼逊学校读书的大都是贫苦子弟，不仅设法为这些贫苦孩子们筹集了赴美学习期间所需经费，还为每个学生的贫穷父母提供至少两年的赡养费。“既惠我身，又及家族，仁人君子之用心，可谓至矣。”容闳晚年这样评价勃朗的善举。

从1847年进入马萨诸塞州孟松中学，到1854年自耶鲁大学毕业，容闳在美国的七年里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终于成了“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的大学者”。经过西方近代文明的系统教育之后，容闳“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他从此立志，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

1854年11月13日，容闳揣着耶鲁大学羊皮纸做的毕业文凭和改造旧中国的远大理想，从纽约登上远洋帆船，踏上归程。

幼年开始接受西式教育，在美国由求知少年成长为青年才俊，对于容闳来说，祖国反倒成了异乡。尽管容闳对国内的“腐败情

形”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回国后目睹的现实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很快就被摆在面前的“阴郁险恶”震撼了。

容闳回到广东之际，两广总督叶名琛正以镇压太平军、三合会暴动为由在广州大开杀戒。容闳这样描写叶名琛制造的血案：“彼两广总督叶名琛者，于此暴动发生之始，出极残暴之手段以镇压之……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予寓去刑场才半英里，一日予忽发奇想，思赴刑场一覘其异。至则见场中血流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予自刑场归寓后，神志懊丧，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于予脑筋中，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①

那个血腥的夏天让容闳成了太平军的同情者，甚至想奋起“为之响应”。但是冷静下来之后，又觉得过于鲁莽，再加上回国后的生活压力，让他不得不从长计议。

谋道亦谋食，容闳希望能找到变革中国与养家糊口相结合的工作，并因此开始频繁更换职业，寻找机会。他为耶鲁大学校友、在广州传教的派克博士当过书记，他到香港高等审判厅当过译员，结果都不如意。1856年8月，在粤港两地辗转一年之后，他搭上一艘运茶船北赴上海。容闳很快便在上海海关翻译处找到了工作，月薪七十五两，比他在广州和香港时都高出许多。但是，他在海关干了三个月之后，还是觉得这份工作“亦不相宜”，又一次递交了辞呈。管理海关的外国总税务司为了挽留容闳，许诺将月薪提高到二百两，无奈他“别有高尚志趣”，执意要离开海关“另觅光明磊

^①（清）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等译，钟叔河导读、标点：《西学东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8页。

落之事业”。

离开海关后，容闳先在一家英商公司当书记，这是他第一次涉足商场，自我感觉获益良多，“于商家内幕及经商方法，已略知梗概”，为其日后事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不过这家英资公司在他入职6个月后就停业了，好在这时容闳在上海商界开始有了些名声，许多中外商人都知道他是受过西方正规教育的留学生。在这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宝顺洋行买办、徐润的师父曾寄圃。

经曾寄圃介绍，容闳结识了宝顺洋行大班韦伯。对这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青年，韦伯自然十分看重，打算高薪聘他为日本长崎分公司买办。可是容闳觉得买办这个身份有损他“美国领袖学校之毕业生”的声誉，只肯作为“公司代表”，到中国内地收买丝茶。韦伯答应了他的要求，派他到长江流域各茶产区调查行情。容闳借着这个机会，于1860年深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对那个他曾经许为“正当”的政权进行了实地考察。

天王洪秀全的族亲干王洪仁玕早年曾在香港教会担任教职，容闳居留香港时与之相识。此番故人来访，洪仁玕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容闳也怀着满腔热情，将自己改造中国的设想倾心相告，向洪仁玕提出富国强兵、革新教育、改良政治等7条维新建议，其核心还是他早在美国便已形成的理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亦即所谓“教育计划”。据容闳说，洪仁玕“居外久，见识稍广，故较诸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予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但是，洪仁玕并没有掌握太平天国的实权，无力推行这些变革之策，再加上容闳对其他太平军领袖印象欠佳，认为他们难成大事，“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在“天京”

毫无建树地住了些日子之后，他拒绝了洪仁玕给他送来的一方官印和四等爵位，讨了一份可以在太平天国控制区自由通行的护照，告辞而去。

这次失败的“天京”之行，让容闳彻底放弃了通过太平天国推行“教育计划”，“改良政治”的幻想，“不得不变计”。他想“从贸易入手”，积累一些财富之后可能更容易实现维新中国的宏图大志。所以在离开南京之后，他才真正开始专心考察各地茶叶产区，像个茶商那样关心起市场行情了。

容闳“从事贩茶之事”前后大约三年，先为外国公司做经理人，后“辞职自营商业”。经商虽然不是他的志愿，但生活过得还算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境况殊不恶”。

1863年，容闳在九江经营茶叶期间，忽然收到来自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安庆于1937年前一直是安徽的省会）的一封信。写信人名叫张斯桂，宁波人，1857年在上海与容闳相识，据称是“中国第一炮舰之统带”，后来去安庆做了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于1862年任两江总督，在其还没有打下南京前，其总督府设在安庆。

张斯桂的来信让容闳感到十分意外。当初在上海，他们也只是“人海中泛泛相值耳”，而且已经多年没有联系，现在张斯桂突然来信说“承总督（曾国藩）之命”，邀容闳去安庆一行。容闳越想越觉得这事来的可疑。他担心，由于自己曾经去过“天京”，而且受到了太平军领袖的盛情款待，被官军当成了通敌的奸细，如今要骗他去安庆问罪。虽然他也觉得以张斯桂的为人，应该不至于出卖朋友，但终究不敢贸然前往。踌躇再三，为慎重起见，容闳给张斯桂发了一封礼节性的复函，一方面“深谢总督礼贤下士之盛意”，一方面以新茶刚刚上市，各处订货者多，放不下生意为由婉拒了安庆方面的邀请。

两个多月后，容闳又收到了张斯桂的第二封来函，除了要他速往安庆，还附上了李壬叔的亲笔信。李壬叔，清末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在上海与容闳有过交往，对容闳这位完全受美国教育的留学生十分欣赏。他和张斯桂一样，这时也在安庆给曾国藩充当幕僚。李壬叔在信中说，他知道容闳“抱负不凡，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国得致富强”，因此在曾文正公面前极力揄扬。现在总督有一桩极重要的事情，要委他专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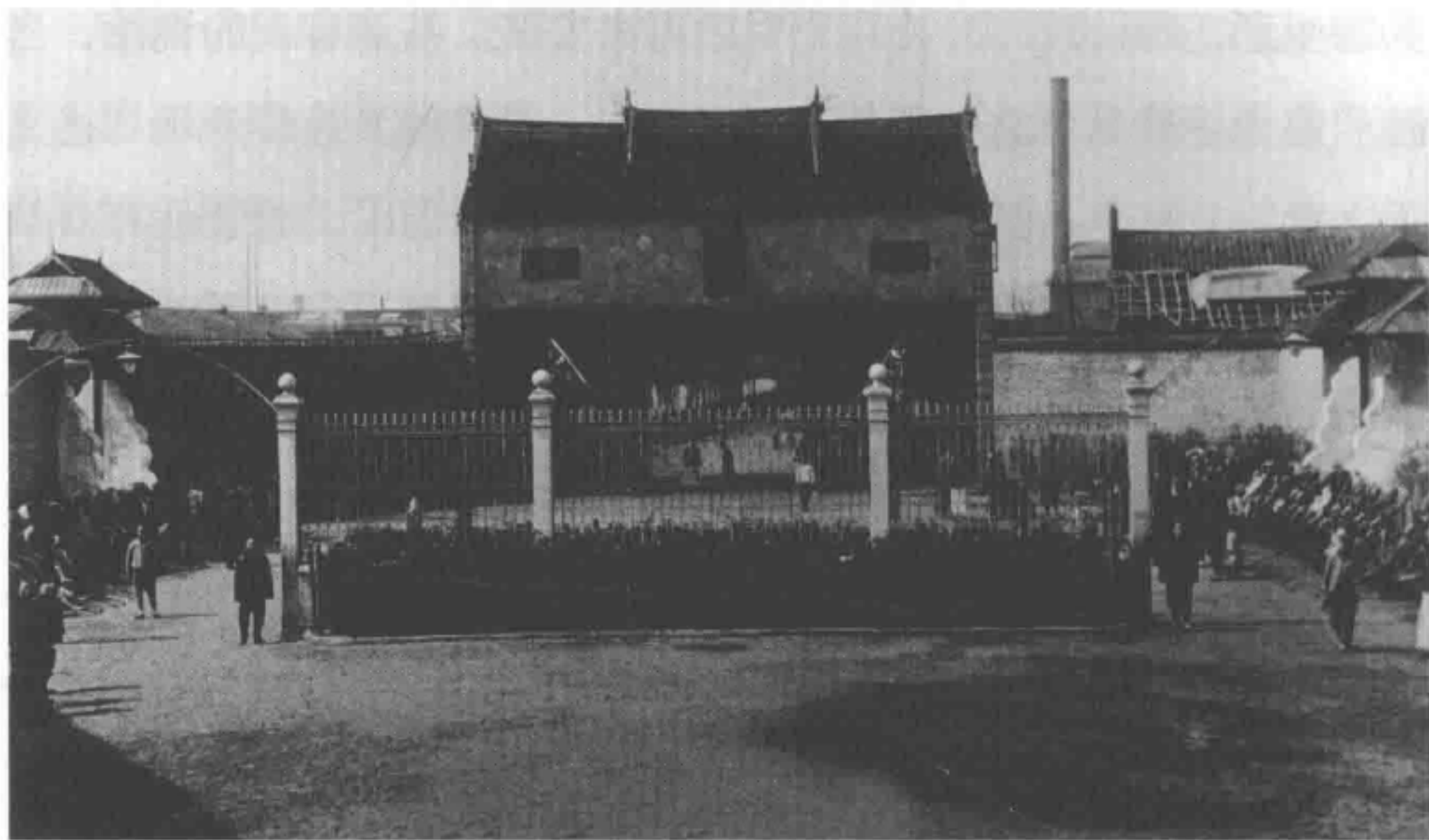
容闳看到李壬叔的来信后，虽然疑团尽释，却不想立即放下手头的生意，所以只应允待几个月后再去安庆。按照容闳的说法，当时“曾文正欲见予之心甚急”，李壬叔、张斯桂又连续来函“述文正之意”。在李、张两人一再表示，总督求贤若渴，想让他弃商从政，在督府里任事之后，容闳才猛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如果有曾国藩助力，他朝思暮想的“教育计划”便有了实现的可能。于是马上修书一封，决计应召前往安庆。

容闳匆忙结束了九江的茶叶生意，于1863年9月乘船赶往安庆。抵达安庆的第二天便受到了曾国藩的接见，他将这一天称之为“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并且详细地描绘了当时情景：曾国藩让他坐在面前，含笑不语数分钟，先以锐利的目光将他自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又“双眸炯炯，直射予面”，特别注意观察他的两只眼睛。又过了一会儿，也许是曾国藩觉得已经把眼前这个留洋回来的广东人看穿了，才开口问了一些他的基本情况。这次会面过程大约只有三十分钟，却决定了容闳以后的人生。事后他才得知，曾国藩对他的印象不错，觉得他是个意志坚强，堪当大任的年轻人。从此之后，容闳彻底抛弃了买办商人身份，成为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直接参与者，“西学东渐”的有效推动者。

又过了几天，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与他商议创办“机器厂”

事宜。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曾国藩决定授予容闳全权，赴国外探询专门的机械工程师，考察、采购适用的机器设备。这个准备兴建的“机器厂”选址在上海城西北的高昌庙，它就是日后著名的“江南制造局”。

1865年，容闳带着从美国采购的机器设备回国。鉴于“此行历途万里，为时经年，备历艰辛，不负重托”，曾国藩举荐他为候补同知，在江苏省行政署任译员。



江南制造局大门。

1867年，曾国藩在容闳的陪同下视察江南制造局，现场观摩美国机器运转之妙，非常开心。容闳趁机建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立一所兵工学校，培养中国自己的机械技术人才。曾国藩对这个想法极为赞许，当即让人着手办理。

江南制造局兵工学校的成功开办，让容闳看到了进一步实施教育计划的希望，也使他获得了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信任和支持。容闳这样评价两位洋务要人：“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

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当日政界中重要人物，而与余志同道合者，又有老友丁日昌。丁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①

丁日昌，1823年生于广东丰顺县汤坑镇金屋围，是容闳的同乡，也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僚，由于这两层关系，两人“颇投契”。丁日昌出身贫寒，早年科场不顺，屡试不第，直到30多岁才靠“军功”当上了江西万安县县令。后来投到曾国藩门下做幕僚，开始崭露头角，仕途得意起来。容闳自美国采购机器回国，因功授候补同知的时候，丁日昌官任上海道台，直接主持了江南制造局的创立。没过多久他便由盐运司、藩司升任江苏巡抚。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这个后来简称为“西学东渐”的教育计划，是容闳矢志不移的追求目标。为此，他专程赴苏州巡抚衙门拜谒丁日昌，并得到了鼎力相助。丁日昌让他尽快写一份详细的“说帖”，上报文相国“请其代奏”。这个文相国，就是文祥，清廷洋务派首领之一，时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丁日昌的积极响应自然让容闳“惊喜交集”，立刻将他的计划撰为四则条陈：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以去除传统内河漕运“水程迢迢，舟行迂缓，沿途侵蚀”的弊端；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

^①（清）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等译，钟叔河导读、标点：《西学东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6页。

这四则条陈，其实已经包含了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日后兴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以及各地逐步开始修建的铁路都与容闳的建言有关。可在当时，他却不敢奢望朝廷将它们全部采纳。按照下臣上呈条陈“例有准驳”的潜规则，位列第二项的建议被准奏的可能性最高，所以他才把最核心的教育计划藏在了“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的后面。

世事难料，容闳的条陈送上去两个月后，从丁日昌那里传来消息，文祥丁艰（丁忧，母病故，回家守孝），不得与闻政事，没过多久，文祥自己“亦相继为古人矣”。容闳心怀多年的宏图伟愿，“才见萌蘖，遽遇严霜”。

在此后的三年间，容闳始终对自己的教育计划念念不忘，每遇丁日昌“必强聒不已”，还时常请他向曾国藩陈情。

1870年，天津发生仇教事件，焚毁教堂，曾国藩、丁日昌等人作为钦差奉旨前往调停，容闳也终于等到了机会。为了便于和洋人谈判，丁日昌招容闳为译员。交涉结束后，容闳借机向丁日昌进言，请他向曾国藩重提教育计划。一天晚上，容闳已经上床就寝了，丁日昌突然闯进来，对他讲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曾国藩同意和时下正在天津的丁日昌等四位钦差大臣一起联名上奏，力促政府首先采纳实行他的教育计划。

1870年冬，曾国藩办完天津教案，回任两江总督。他刚抵达南京，就接到了朝廷的回复：“着照所请。”用容闳自己的话来说：“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分四批派出120名幼童生官费赴美国留学，原计划各期学生留美学习15年，四批前后总计20年。不料在1881年全体中国幼童即奉召勒令返华，容闳的教育计划被迫中

断。尽管如此，它仍然开创了西学东渐、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先河。正如曾国藩、李鸿章在另一份联署奏折中所说的：“伏查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1881年7月，中国幼童离美返华时，《纽约时报》特以《中国在美国》为题发表社论，对这个创举予以高度赞扬：“中国幼童留美计划，在美实施历时10年，以美国观点看，是相当卓越有成就的！”同时，也对这个计划的天折感到惋惜：“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撤回，显示中国政府仍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对那些赞扬中国已经同许多国家一样走上开放改革进步的不归之路，这项措施是个无情的反证。”

尽管容闳的教育计划未能最终完成，但它仍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推进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材。赴美留学的幼童唐绍仪，后来成为民国首任国务总理，促成南北议和；詹天佑，领导建成中国第一条自筑的京张铁路，成为第一个加入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及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中国人；梁诚，曾任驻美公使，主持交涉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唐国安，曾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首任校长；蔡绍基，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周万鹏，曾任清政府电政总局局长……当年的留美幼童们，纷纷成为外交、教育、铁路、电报、海军、海关、实业、法律等各个新兴领域的开拓者。

伴随着甲午战争的硝烟，曾经被一代人寄寓了无限期望的洋务运动也黯然落下了帷幕。然而，那些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幼童却在顽强成长。詹天佑在美国所读的那所中学有一句校训：“在实践中求希望。”这也是那些留美幼童的共同写照，他们一直在为沉沦中的祖国寻求着新的希望。

1876年，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为表彰他对中美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特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78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

副公使，中美邦交开始“正常化”。1898年，他回国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离北京，此后在美国定居，直至1912年病逝。



如果说容闳是清末那场洋务自强运动框架方案的首倡者，徐润、唐廷枢则是这个方案的落实者，再加上郑观应这个维新思想家的理论支持，活跃在上海的粤商群体组成了推动旧中国向近代化转型的中坚力量。而容闳、徐润、唐廷枢、郑观应都是自粤商脱颖而出的。

容闳的“教育计划”终于启动了，这也成了徐润投身洋务运动的契机。徐润在其自叙年谱里这样写道：“（同治十年）冬十月，奉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札委，办理挑选幼童出洋肄业，陈荔秋（兰彬）、容纯甫（闳）带领去美，每班三十人共一百二十人分四年出洋，经费由海关发给……”不仅如此，徐润还在自己的年谱里详细开列了每一批出洋学子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所学专业，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

1872年，徐润送走了留学肄业局监督陈兰彬、副监督容闳和第一批留美幼童。一年后，他经唐廷枢引荐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札委”，出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开始深度参与洋务运动。

上海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企业，也是洋务运动的标志性产物。“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这个容闳当年与“教育计划”一起提出来的设想，直到1872年才被李鸿章重新提倡、实施。

作为一个内敛型的农耕民族，中国的海上贸易和运输不仅从未得到过充分发展，而且被历代统治者以影响稳定为由强加抑制。